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 / 朱嘉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2012.01
冊 ;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C66-YLC68)

ISBN 978-957-32-6920-5(上卷 : 平裝). --

ISBN 978-957-32-6921-2(下卷 : 平裝). --

ISBN 978-957-32-6922-9(全套 : 精裝)

ISBN 978-957-32-6752-2 (平裝)

1. 貨幣史 2. 中國 3. 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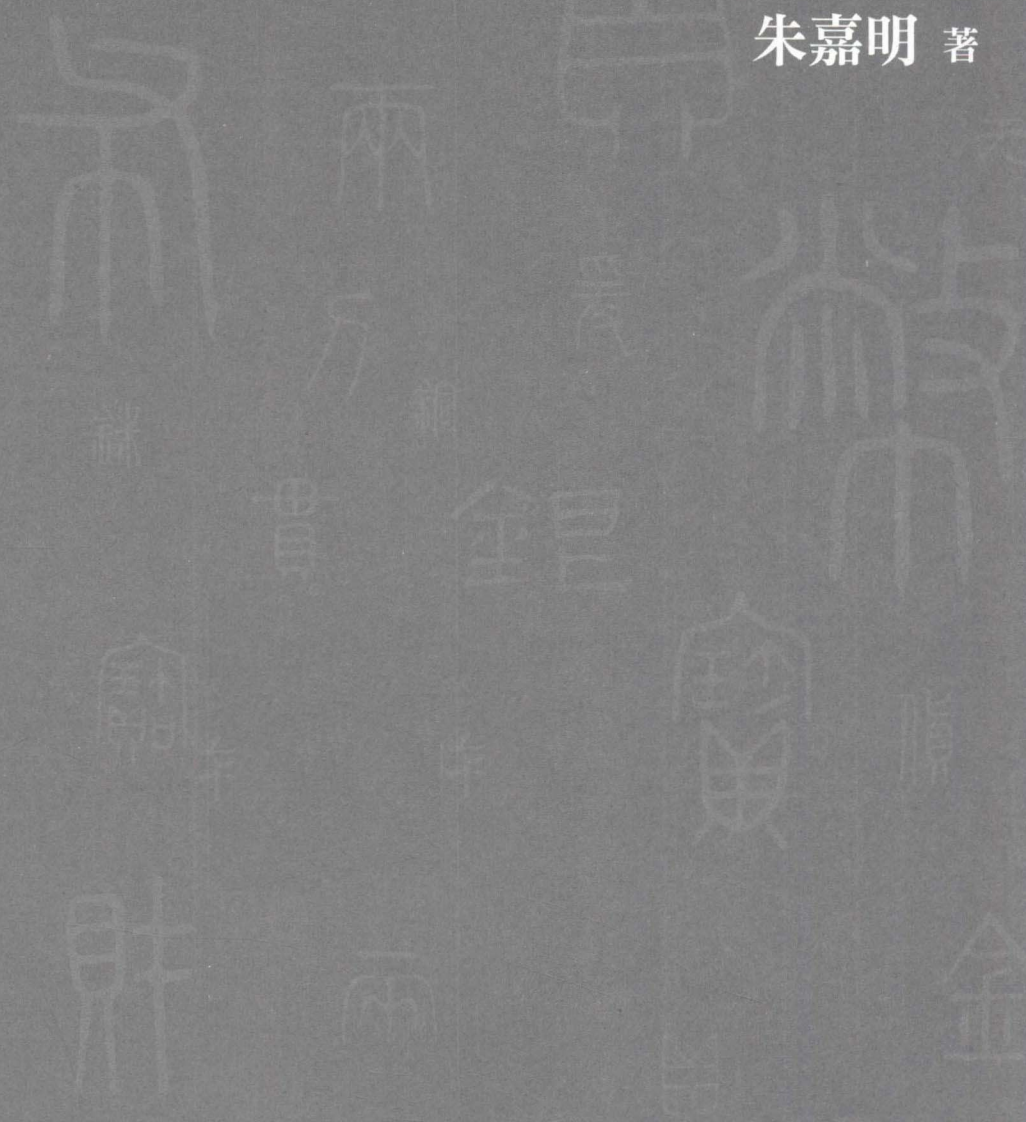
561.092

100026237

從自由到壟斷

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 **上**

朱嘉明 著



目錄

上卷

推薦序

哈耶克 vs 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四

推薦序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八

序言

廣袤又迷人的貨幣經濟花園

十二

第一章

傳統：自由、多元和非國家化的貨幣經濟

(先秦—明清)

三二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三四

多元化的貨幣體系

四十

政府與民間分享鑄幣權

六四

民間和市場主導借貸資本

八三

土地、勞動力和產品的貨幣化

一〇一

貨幣供給長期不足

一二五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和國際經濟

一三六

結論：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相互依存

一五四

第二章 過渡：從白銀貨幣化、「銀錢複本位」到

「多元本位」(一四三六—一九一一)……………一七六

明代的貨幣經濟：從紙鈔到白銀化……………一七八

「晚明之謎」……………一九九

清代：貨幣部門、貨幣供給和通貨膨脹……………二一四

清代貨幣體系的複雜機制……………二四七

咸豐朝的幣制改革……………二六六

光緒年間的幣制改革……………二七三

第三章 轉型：從「銀本位」到現代信用貨幣制度

(一九一一—一九四九)……………三一二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〇年代初的貨幣經濟……………三一四

一九三三年：確立「銀本位制度」……………三三七

一九三五年：法幣改革……………三五三

幣制改革的共識、決策、實施和管理……………三七一

法幣改革與抗日戰爭……………三九九

一九三五年幣制改革再評價……………四一〇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從通貨膨脹失控到貨幣金融體系崩潰……………四二三

共產黨貨幣：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四四一

哈耶克 vs 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魏格林博士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嘉明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是放任的。不論是宋代的紙幣還是明朝的白銀化，都來自民間的創造，而非政府的設計。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貨幣系統不是一個依賴國家的系統。各種貨幣同時存在，同時流通，保障了經濟順暢運行，發展出一個包容性很強、靈活性很大，容許遠距離區域貿易的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發秩序理論和貨幣非國家化理想。哈耶克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經濟，但是中國貨幣經濟卻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經驗證明。這是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到現在為止，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思想被認為是空洞、假設性、沒有實際基礎的，遑論有學者試圖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哈耶克之所以進入有關中國傳統貨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以及當下國家發動現代化的過程，是極為有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開始產生影響，而朱嘉明是在這個脈絡下選擇以哈耶克來解釋何以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有那麼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澤東時代中央計畫失敗的原因，還有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教義」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凱恩斯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時，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開始設計政府干預經濟戰略之時。國民黨的工業化戰略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家必須在現代化中起主導作用，現代經濟需要國家控制金融體系。

這是國民政府啟動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一九一到一九二七年間，經濟在國家極端虛弱而無干涉能力的條件下得到充分發展，而一九二七年以後，在日本與蘇聯的成功影響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國家對經濟的主導。儘管這項改革比凱恩斯革命早

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家也受到凱恩斯的影響。國民黨的「廢兩改元」，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一九三五年又將之拋棄，引進法幣，是向貨幣現代化的躍進。

但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有兩個未預見到的影響：一是它為政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印刷紙幣。而這種新的可能性導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的通貨膨脹；同時也給共產黨提供了機會，發展非法紙幣，直至摧毀國家貨幣系統。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強調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然而，讀了此書之後，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貨幣的威力。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所以，一九四八年之後，當國民政府通貨膨脹處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產黨的人民幣成了一種替代性貨幣，使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增強了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最後人民也在政治上轉而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中國經濟史上轉向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和第一次高潮，而這個階段以崩潰告終。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凱恩斯經濟學始終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經濟理論，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強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曾在世界幾乎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這部著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中國一步一步建設市場化混合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有啟發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凱恩斯，是為了瞭解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內在邏輯；用哈耶克，是基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為了批評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不足。大多數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凱恩斯來衡量與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認同中國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也認同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於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批判這個過程，更不用說有人走得像哈耶克

那麼遠，去批判國家透過貨幣對經濟施加強大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施加的控制。

貨幣經濟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歷史性倒退。貨幣在毛澤東時代是國家壟斷的。根據哈耶克的思想，這是人們為什麼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是經濟主體依賴國家來維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時代，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回歸貨幣經濟，實施經濟的貨幣化。中國經濟增長跟中國經濟的再貨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過這個再貨幣化的過程又是在國家愈來愈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經濟的貨幣化是伴隨著國家從貨幣系統退讓而進行的。它打開了向非國有經濟活動的機會之窗，使他們得到不再依靠國家而生存的機會。反過來講，經濟的貨幣化是在以國家為現代化的總組織者和總設計者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從一九七八年建立起來的體制，非常類似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失敗告終。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今天的凱恩斯主義體系，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於維也納大學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王巍博士

讀畢朱嘉明先生六十萬字的論著，一幅縱向描述中國金融史的《清明上河圖》徐徐展開。靜心把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兩千年貨幣經濟演變栩栩如生。此等格局，這般功力，正合嘉明先生本性。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嘉明先生講演，正為此公意氣風發問政獻策之際。莫千山改革會議的組織奠定了他當代思想家的底色與視野。一本《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洛陽紙貴，展示他大格局解析複雜系統的思維能力。

一九八九年到九一年間，我們在美國為鄰，不時添酒回燈徹夜長談。於政治之外，他更著眼於野史與掌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解構，究心之術開始取代殿堂對策。仍隱約記得一起策劃建立海外金融機構，隔靴搔癢，聊補嘉明未能參與國內金融改革之遺憾。

二〇〇八年，再見嘉明先生則是歷盡滄桑再著書之狀。海外曲折經商和顛沛流離的磨礪更打造一個對話的立場，而非高頭講章之狀。貨幣經濟史成為他學術新旅的起點，皆因凱恩斯有言，從金融角度觀史，歷史將被顛覆，此語更合嘉明先生意興。

觀之中國金融通史，古道斑駁，罕有人至。士農工商序列之中國，金錢乃不雅之物，於史乏陳。民國金融史家，多成名於考據和資料整理。共和國建立之後，金融學大抵淘汰，成為財政學之附庸，銀行與各種金融機構也是名存實亡，不務正業。加上意識形態主導，金融理論幾近無存。

最近三十年，金融界死灰復燃，蒸蒸日上，但商業氣氛濃郁，鮮有學者甘於寂寞守住書齋。大

學中的金融史專業幾乎絕跡，海外學者也不過以西方金融通史來附會中國現狀。有觀念之書，無學理之作，這也是何以金融陰謀論一時盛行於坊間的緣故。

我在創建和經營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幾年中，苦尋金融名家和金融史料，上下求索，深知此域之荒蕪凋零，諸多名流不免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即便在西方，金融史也是冷門。每遇金融危機出現，便有若干學者痛定思痛，搜羅一圈史料，做些新解，炮製幾本暢銷書，僅此而已。一本金德伯格的《西歐金融史》主宰了半個世紀的西方教學，近年英國人弗格森出版的非學術作品《貨幣的崛起》也是一路暢銷全球。當下未了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風雲際會新學興起之時。厚積薄發的嘉明先生因勢利導，適時推出此卷，高屋建瓴的梳理了兩千年中國貨幣的歷史脈絡，奠定了當代貨幣經濟的獨特格局。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架構歷史橋樑。披沙瀝金，孜孜以求，解讀從來誤曲。箇中艱辛，需行家體會；整體突破，必高手心知。

以在下淺薄心力，無以學術置評，但此書填補貨幣經濟通史之空白，則不言而喻。單單共和國成立以來六十年的當代中國金融里程之鋪架，便前無古人。此六十年實在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中國，即便全球也是豁然開朗。不足當下，則前史無義，未來無據。史家與思想家之重要分野便在於把握當下之能力，這也是嘉明最著力、最擅長、最豐富的領域。

朱嘉明先生對貨幣邏輯與歷史脈絡的設計與表述建立了一個討論平臺，箇中觀點與論據的展示或有不同立場之別，見仁見智之度。生活態度、價值取向和思想資源等差異將衍生出無數不同的看法和結論，這恰恰是一個公共平臺建立的成功標誌。如同舉著火把照亮洞穴的先賢，能夠看到後來者紛紛在光芒普照下尋覓各自珍寶之時，嘉明先生應當會感到滿足的。

作為老友和同行，我也欣慰的期待著這一縷光芒。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於北京

序言 廣袤又迷人的貨幣經濟花園

朱嘉明博士

一九三〇年，凱恩斯在《貨幣論》中說過：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¹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是我對中國漫長貨幣經濟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壹

貨幣經濟是一種依靠貨幣形態、價格機制、資本市場、信用體系和金融機構的制度性組合，其中又以貨幣形態為核心。在經濟史上，貨幣經濟是經濟活動、經濟組織、經濟制度的基礎。貨幣經濟支撐市場經濟和所有實體經濟部門的運行。貨幣經濟的形態和數量的變化導致資本結構和數量的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決定經濟週期，影響著人類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在現代經濟形成之前，貨幣經濟依附於實體經濟；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貨幣經濟平行和相對獨立於實體經濟；在後現代化經濟中，貨幣經濟則有凌駕於實體經濟之上的趨向。

中國貨幣經濟是動態的，有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從封閉到開放的發展過程。解析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特殊性和內在邏輯，牽涉到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演變。

本書把自先秦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貨幣經濟史劃分為兩個階段：金屬貨幣經濟（即傳統貨幣經濟階段）和以信用貨幣為主體的現代貨幣經濟。

金屬貨幣階段又分為以銅錢為主體貨幣、以白銀為主體貨幣、以白銀和銅錢為「複本位」貨幣，和以銀元為法定貨幣的四個時期。以白銀為主體貨幣時期為例，它始於宋代，經過元朝到明朝

上半葉的衰落，再經過明朝中後半葉的白銀化而成為貨幣經濟主體。清朝繼續明代的銀兩制度，直到民國建立之後的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前後八百餘年。

中國是發明和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宋代的紙幣系統已相當發達，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時期以紙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但是，宋、元、明的紙幣並不是信用貨幣，也不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具有法律意義的紙幣（legal tender）。直到一九三五年，南京國民政府廢除實行不足兩年的「銀本位」，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義的法幣體系。如果以一九三五年作為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的分界，則中國傳統貨幣經濟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而現代貨幣經濟的階段還很短暫，至今不足八十年。

貳

亞當·斯密曾說：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不公的。他們欺騙臣民，把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次第削減。² 這個結論可能適用於很多歐洲國家，卻不適合中國傳統貨幣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貨幣經濟基本上是自組織的，是市場的、社會的，是民間和政府分享貨幣「鑄造權」的，是藏富於民的。至於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向來是由民間而不是政府控制，國家只是貨幣的參與者，國家貨幣只是龐雜貨幣中的一種而已，其影響力取決於在貨幣供給總量中的佔有率，高一些，影響力大；低一些，影響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對貨幣權力的絕對壟斷。簡言之，貨幣經濟的非國家化是常態。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充滿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萬曆皇帝頗受詬病，幾十年不認真早朝的「罪過」大矣。換個角度，皇帝缺席，國家照樣運行。雖有關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統忠於職守，依然顯

示出其時社會發展的自主運行狀態。我們怎麼能夠設想，今日中國國家領導人如果缺其席不謀其政，這個國家還能正常運行嗎？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的中國貨幣經濟是人類貨幣經濟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後五、六十年的貨幣經濟，被主流史家描寫為貨幣制度紛繁雜亂、落後，逐漸遭到西方列強控制。但歷史的面貌並非如此簡單。當時清廷一方面繼續奉行「無為而治」的經濟思想；另一方面，朝廷無暇、也無能力管理因為「洋務運動」引發的現代化浪潮。因而，中國進入自由經濟的黃金時期：國內、國際資本湧入各類產業；經濟繁榮，接近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的自由經濟傳統模式。從貨幣經濟的角度考察，我們看到的歷史與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異很大。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中的交易關係，其本質是民眾、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產權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換言之，貨幣經濟、私有產權和商品市場經濟的相互依存支撐了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運行，並決定了財富的存在方式、擁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國歷史上可以發生一次又一次的財富重分配，卻沒有發生經濟史家所說的那種「財富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現象。在一五〇〇年相對富裕的文明中，比如印加、阿茲特克，都被自身的貨幣財富所腐蝕，最終消亡。³但是中國社會卻具有對「財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癒能力，這不能不歸結於傳統貨幣經濟的貢獻。貨幣形態多元化、多樣化和高度區域化，「貨幣之間競爭」的機制，不斷向貨幣體系注入新的生命力，從而實現貨幣經濟的和諧，這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即使朝代更迭頻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續「前朝」的貨幣體系和制度。中國傳統貨幣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穩定性，成為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

當然，中國貨幣制度的穩定並不是絕對的，其變遷始終沒有停止。所謂穩定，是變遷中的穩

定；所謂變遷，是緩慢、漸進、連續的變遷，猶如歷史的長河緩緩流動。中國貨幣制度的變遷，集中表現為要素（土地與勞動、勞動與資本或資本與土地的）價格比率的變化，資訊成本的變化，技術的變化。這些相對價格變化的因素大多數是內生的。⁴春秋戰國時期、宋朝、明朝後半葉，以及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清朝，都屬於貨幣制度變遷顯著的時期。

參

有一位西方學者說：貨幣將決定人類命運（Money will decide the fate of mankind）。⁵其實，貨幣經濟已經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和命運。

中國自漢朝以降，直到清末，「錢荒」不斷。長期以來，人們對錢荒的理解過於簡化，以為是銅錢的幣材供給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實，錢荒的核心問題是以銅錢為主體貨幣形態的貨幣需求大於供給，或者說，貨幣供給滯後於需求的反應，不能滿足市場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在貨幣非國家化的制度下，自組織的社會經濟就會增加貨幣供給，於是，正規、非正規的，合法、非法的「貨幣」進入市場。以宋朝為例，再怎麼增加銅錢供給也無法滿足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銅錢供給畢竟受制於幣材市場、鑄造能力和鑄幣成本，所以，鐵幣和紙幣的發明和流通，就成為自然補充。在中國歷史上，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很難成立，兩者和平共處。原因很簡單，對於貨幣短缺的情況，即使品質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幣」，只要能夠充當交易中介，有勝於無。一般而言，錢荒多會自行緩解。但若自我緩解能力失靈的話，銅錢、銅材愈發值錢，加劇錢荒，經濟蕭條接踵而至。

中國大多數朝代，不是亡於通貨膨脹，而是亡於經濟蕭條。因為，只要在金屬貨幣形態下，不會發生現代人所熟悉的那種通貨膨脹。其實，秦朝不是亡於苛政，而是亡於經濟蕭條。秦末經濟蕭

條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駕崩前一年「統一貨幣」的幣制改革，推行「秦半兩」，徹底消滅六國貨幣的殘餘影響，摧毀了傳統的多元貨幣制度，於是，貨幣供給不能滿足需要，出現「物賤錢貴」的局面，於是農民受到傷害，手工業者受到傷害。西漢的滅亡和王莽關係很大。王莽在貨幣經濟上的根本錯誤是實現黃金等貴金屬資源國有化，民間喪失了貨幣財富，而政府的貨幣供給不足以填補民間貨幣的缺失，自然導致經濟蕭條，農民破產。王莽死後，國庫裡留下大量的黃金。明朝的貨幣白銀化，社會財富增長，刺激人口增加，導致了「高水準均衡陷阱」，社會經濟失衡，構成李自成代表的農民革命的深層原因。⁶ 崇禎年間中國白銀進口突然減少，貨幣供給不足，百業蕭條，政府失去稅收基礎，則是明朝覆滅的重要原因。

中國貨幣供給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貸市場。中國歷史上的利息水準始終高於西歐和日本，這不是因為中國貨幣經濟不發達，而是過於發達所致。恰恰因為資本成本過高，刺激貨幣資本所有者透過高利貸市場和其他「投機」(speculation)手段實現更高的回報率。貨幣「投機需求」的直接後果是增加貨幣需求，提高了貨幣供給壓力。在沒有足夠儲蓄機構的情況下，投資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貨幣財富轉化為土地所有權，貨幣利息轉化為地租。於是，資本和土地這兩個基本生產要素的價格雙雙上升。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沒有發生英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又多了一種解釋，即中國的資本和土地成本過高。

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和土地關係實在值得重視。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貨幣經濟發達。土地是高價值的交易資產，其吸納貨幣的規模遠高於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市場。土地吸納更多的貨幣，刺激更高的貨幣需求，如此反覆，最終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重複了歷史上早已有之的貨幣和土地關係，土地價格上漲和貨幣供給增大互為因果。在中國歷史上，如